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二期 ——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2b)

【史海钩沉】	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余汝信
【往事非烟】	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裴 毅
【抗拒遗忘】	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 《南京“八三”事件档案》引起的思考	华新民
【各抒己见】	否定文革面面观（下）	沈 昆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 余汝信 •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1〕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2〕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刘志坚的回忆录值得重视，原因有三：一，参加座谈会人员中，目前从公开渠道所知仅刘志坚留有此过程的回忆；二，此后几乎所有论及“纪要”产生过程的著述，都是直接或稍改头换面抄自该回忆录；三，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在未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形下，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也只能是出自于刘志坚的回忆录。

一、“座谈会”是江青提出召开的

刘志坚的回忆录称：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根据刘志坚以上回忆，可以得知：座谈会的事，是江青找到了林彪，而不是林彪去找的江青。而且，我们至今尚不知道江青此举到底是个人的行为还是毛泽东的意思（按常理推测应是后者，但目前并无直接证据），如江青对林声言是毛的旨意（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林彪又岂能对其置之不理？刘志坚说他与总政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其实叶群也不知道江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以为只是“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江青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4）

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

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都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路线在军队中的积极贯彻者。刘志坚不久后是第一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又与谢镗忠代表军队参加1966年5月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刘任副组长，谢任组员；谢镗忠、李曼村还是1967年1月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刘、谢、李1967年先后“靠边站”，文革结束前后又重新恢复工作，这是后话。

参加座谈会的四人之中，陈亚丁运气差了点。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75年一度复出，主持重新设立的总政文化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被视为“四人帮”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又遭批判，自此从政坛上消失。刘志坚回忆录中对陈亚丁似也“另眼相看”，很多事都往陈身上推。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并不知道陈本人对此有何说法。

此外，刘志坚上述关于谢镗忠的叙述可能有误。1965年，总政文化部领导班子调整。当年7月，原任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谢镗忠调任文化部部长，空缺由鲍奇辰于次月接任。刘志坚说谢经任命后半年尚未到职，似不确。（5）

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

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洗衣舞”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所谓“几个人共同的意见”，尤其是1966年初已能直言“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是否确有其事？难以查证，总使人有些怀疑就是了。不过，“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就并非如此。四人尚未回京，“纪要”初稿已经草成。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并无过分之处。

二、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了陈丕显的老底——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这一顿晚饭，陈丕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绝对不会提及的。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刘志坚向林办的汇报“并请指示”，没有下文。可见林彪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6〕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回忆录接着叙述了江青谈话的五点主要内容，因为是以1980年代的思维方式写的，多为事后的批判言语，意义不大，故本文略去未引。

注意上文中有关杨成武的叙述。杨成武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这是杨成武当时的真实面目。刘志坚加这么一句，不知是否“别有用心”？

三、“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刘志坚在回忆录中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样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刘志坚以上叙述，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1、按刘志坚在前文中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2、按刘志坚自己的说法，他们四人临离京时“共同的意见”只是“带耳朵听”，但刘志坚在座谈后却要陈亚丁对江青的谈话进行追记，这不仅违背了江青本人的意愿，也违背了他们自己共同的意见（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的话）。

3、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

4、《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

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文艺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

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当时我们4人还研究了这篇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本意是否表功？未可考），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四、毛泽东要陈伯达等参加修改

据刘志坚回忆，林彪说材料“搞得不错”，江青说“根本不行”，林彪说“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江青“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去”。江青更抬出了毛泽东，称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无来参加修改。有毛泽东幕后撑腰，自然江青的淫威就压倒了林彪的意见。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象《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 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

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2. 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 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 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 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

6. 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五、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

要”的主要观点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7〕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8〕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毛将“委托”两字强加于林而林又不好说什么，由此可见毛政治手腕的确老到！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在“要破除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9〕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10日上午，我同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11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三十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日修改完毕，15日我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 在第一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 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 增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 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 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化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 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 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 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刘志坚此处的回忆也很重要——林彪根本没有什么“建议”，而江青等一口咬定是“根据林彪建议”，这与毛泽东所加“林彪同志委托”六字一样，都是强加于人的，并非是什么“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10）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 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 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 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 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 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 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 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的所谓“建议”，其实是吩咐江青，将“纪要”“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地方，推广至全国。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林彪此信，原信抬头致“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刘志坚将其称为“给军委常委的信”，该信1967年公开发表时标题也改为《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并不准确。因军委常委除林彪及上述诸人外，时还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时贺龙等皆为军委副主席，不如改为“军委其他副主席”更为贴切。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很显然，“纪要”是毛江夫妻店的产物。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故而，与其冒着“林彪同志委托”的虚名，不如实事求是，正名为“毛泽东同志委托”！

六、“纪要”的内部批发与公开发表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

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帐。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11〕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没有说明白，其实值得推敲。“纪要”的批语要重写，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其实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

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指的应该是报社党委书记华楠（总编辑），副书记唐平铸（副总编辑）以刘志坚自己的以上叙述，萧华、刘志坚及解放军报负责人都可谓是一时的积极分子。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年1月4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年5月李曼村、谢镗忠也在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67年5月公开发表的“纪要”与抬头经修改的林彪给贺龙等的信。

1967年年中以后，萧华靠边站。他的名字，从重新整理后再次发表的“纪要”中删去。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的名字从重印的“纪要”中删去。

注释：

〔1〕〔2〕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3〕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文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楷体字部分）均引自该文。

〔4〕《为人民立新功——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页39。

〔5〕见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56，58。另据《鲍奇辰传略》（自印本，2001年12月），鲍（原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1965年8月底已到总政报到，9月上旬即到群工部上班。

〔6〕刘志坚原注：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7〕〔9〕〔10〕刘志坚原注：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8

〔11〕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40。

□ 选自《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

## 【往事非烟】

### 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 裴 毅 •

1966年到1968年，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人人都胸佩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个个都手捧毛主席语录，在各种会议和集会场合，都激动地高举语录，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无论是机关、部队、学校还是工厂、商店、街道，每个单位都要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都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引向极致。

本人曾在海军参加过几次带领中学红卫兵接受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或长安街接见红卫兵宏大激动的场面，也参加过几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有关军兵种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只见许许多多连队干部和战士代表，每人都拿着一块别满了连队或排、班干部战士个人毛主席像章的布块和毛巾，当毛主席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现场时，拿出来面向毛主席又抖又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跳动，高呼万岁。他们回部队后，都要举行隆重的不同仪式，将毛主席接见过的像章发还给每个人，这些没有机会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干部战士，在拿到和别上毛主席接见过的毛主席像章，表现出十分激动和自豪的状态。其中，沈阳军区部队和地方上的红卫兵推行的“忠”字舞，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红卫兵身穿令人羡慕的绿军装，胸别各式毛主席像章，整齐地、慷慨激昂地表演各种形式的“忠”字舞，已成为当时红卫兵运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更有甚者，我当时因任务出差经过宁波市，见到在市区街道有的居委会的办公室内，看到墙的正中挂着毛主席像，像下放着一张长桌子，摆着一些供品样东西和两支点燃的蜡烛，桌前站着一排低头请罪的“四类分子”，据说，一次要站一至两个小时。当然也有另一种形式，“四类分子”胸前挂牌，在居委会门口的街沿上，低头站立一排，向过往人展示请罪。毛泽东主席，已经成为了民间的真神。

我当时是海军政治部的秘书，1967年因工作需要，随首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秘书工作，当时很多领导机关（包括军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都无法正常工作，为避免受到军内外红卫兵的冲击，军委日常办公地点，也离开了三座门原址，临时迁到了西郊军委总参谋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直管的京西宾馆。对一般外人而言，京西宾馆外表并不起眼，但实际上保密和安全工作十分严密。它的外围是中央警卫一师管辖的布防重点目标之一，内卫是宾馆警卫部门的严格管理，没有必要的手续和内部通知，任何人都无法靠近和进入宾馆。因此，京西宾馆当时一直住着不少在本地区受到冲击，但受到中央首长指令保护的军区司令、政委等首长及其家属。同时，京西宾馆不仅有一个不小的礼堂，而且还有很多间很大的会议室，周恩来总理和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常借用此处会议室，召集有关地区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进京代表进行调解，首长们坐车从后门直开进来，结束后坐车悄然离开，非常隐蔽和安全。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第一次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的。

军委办事组的办公室设在临街主楼的十楼整层楼里，内卫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直接警戒和

管理。由军委办公厅统一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机要文件、会议安排、通讯设施、安全保密和警卫等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直接领导是原军委办公厅金涛副主任（肖向荣主任当时已被迫靠边），经常性的具体日常工作多由秘书科吴一平科长安排。军委办事组首长开始时有这样几位：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组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副组长）、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组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员）以及民航局刘锦平政委（负责政工一块）等。林彪夫人叶群既是林彪办公室主任，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不参加具体工作，偶尔也参加会议。办事组首长各有一（大或小）套间，作为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每个首长秘书和办公厅几位秘书均各有一间带卫生间的客房作为办公和睡觉用。

军委办事组首长处理日常事务，都是跟随毛泽东主席夜间办公习惯和节奏进行，一般在白天处理本部队的机关工作，在晚饭以后六七点钟开始，多数以集体碰头开会形式，在京西宾馆后楼会议室进行。处理包括中央、中央文革布置的有关工作和军委三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请示的有关工作。每次开会，夜12点前结束的很少，多数在深夜两三点钟，甚至凌晨五六点钟结束。所以中间有一点夜宵，就是一小碗面片汤或面条，这是免费的。喝茶的话，无论是首长还是秘书，向服务员要一小包茶叶，都要现付两角几分钱。

我们几个首长秘书的工作，主要是以下几项：每天要看几十份电报和中央下发的三总部、军兵种、各军区甚至是军一级上报的文件电报，重要的、机关的要做出摘要，提交首长参阅；陪同首长参加机关会议做记录；列席办事组每次办公会议轮流做记录，轮流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值班和接待工作等，面上的工作主要由办公厅几位秘书承担处理，他们面上熟悉，业务熟练，工作麻利，值得我们学习。

这期间曾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仍记忆深刻。它发生在兰州，时间大约是1967年秋冬之际的一天（具体日期已记不准确，但在机关档案中可以查到），在我收到的数十份电报和文件中，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车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说实在话，看了这份电报我有一种说不出来和不能随便说的感觉。我本人当时也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代表，也参加过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激动场面，忠于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没有疑义的，但又总觉得像在宁波市见到的一些现象，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有点太形式化了，太神化了，有点给迷信形式连在一起了，确实有点个人崇拜过头了。但又不能也不敢随便讲出来，可是内心总感觉发展下去有些不妥。作为军人的脾气，心里有了想法，就有点憋不住，总想说。于是我鼓起勇气在办公会前，向我的直属首长张秀川主任说了我的看法，给他看了兰州军区的电报。张主任看了后，也皱起了眉头，觉得是个问题，但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他好像也憋不住了，当走进办公会议室，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前，



他走到主持人杨成武代总长的座位旁小声说：“杨总长，×秘书给我看了一份兰州军区的电报，就是这一份（随即递上电报原文），他认为好像有点不妥当，请你看看……”杨成武代总长一愣，随即看了下电文，立即眉头紧锁，马上就说：“怎么搞的！这不是在搞封建迷信一套吗！老吴（即吴法宪司令员）、老邱（即邱会作部长）、老刘（即刘锦平政委），你们都看看，这么搞怎么行呢！”随即吴司令、邱部长、刘政委等分别看了电报，都大声说了开来，都一致认为这种表忠心活动搞歪了，是封建迷信一套，首长们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杨总长马上对邱部长讲：“老邱，你马上给兰州军区×政委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样搞不妥当。”邱部长马上起身到隔壁房间打长途去了。第二天，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马上发来了电报，作了深刻检讨，并声明立即收回前一天上报和下发的这份电报。

□ 《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

【抗拒遗忘】

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
——《南京“八三”事件档案》引起的思考

• 华新民 •

新年假日里友人发来的这一组南京师范学院当年的档案资料，篇幅不大，内容却非常详实，有事件的经过，有参与人的姓名和背景，是这一类文革资料中不多见的。（见本刊201301c：《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它说的是发生在1966年8月3日的事，那一天，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和他的夫人、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敬仪，被南京师院的部分师生揪斗、游街而导致死亡。该事件比人们熟知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领导卞仲耘在八月五日被学生揪斗致死的事件还早两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起领导干部被斗争致死的事件。这些在南京师范学院（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档案室内深藏了三、四十年的资料由于不明原因，流落到民间的拍卖网站上，被关心此事件的人士以不菲的价格购得，才得以重见天日。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年轻人来说，看了这些资料的第一个印象恐怕是事件的血腥以及学生们（包含少量教师）对待批斗对象的残忍。档案之一，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此事件的报告中，这样叙述斗争会和游街的现场：“几个学生架着他们走，连架带拖，卡着李的脖子，不断地打，拖了近三华里，李已昏厥。有人说她是‘装死’，有的学生抓着李的脚在地上拖。教育系学生余焕祥用冷水淋，见李仍然不动，又打了四拳。”“吴被用一条棕绳捆绑，有的学生打他，卡他的脖子，问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由于经数小时被拖、推、打，有气无力，答不出话，当场昏倒，几次被用冷水淋。”请注意，这份事发后六天之内写出的报告指出，吴天石被当时的省委定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已在新华日报揭发批判”，对李敬仪也注明“该校师生揭发了她一些问题”，显然并不是报告撰写人的同情对象，因而实际上发生的暴行只可能比报告的叙述更加恐怖和令人发指。

对于经历过文革或者关心文革历史的人来说，在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都不免会联想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残杀卞仲耘的事件中类似的场景：学校领导被拖出来戴高帽，剃“阴阳头”，淋墨汁，被强迫污辱自己，遭受带有钉子的棍子殴打，在她们倒地后被脚踢，被踩脸，被开水烫……。南京和北京，两个城市空间上相隔千里，时间上只相隔两天，发生了同样的学生斗死师长的事件。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书信是人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两处的学生们用如此雷同的手段折磨他们的师长，不可能是后者对前者的学习效仿，唯一的可能就是两者事先

都出于同一个导师的门下，受教于同一套教材。不用说，这导师就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伟大导师”，而戴高帽子游街这些手段则来自那篇大中学生人人耳熟能详的教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这两件如此相似而又相随的事件呢？对文革历史有一点粗略印象的人们或许会联想到在1966年8月份如狂飚突起的红卫兵运动。不过，如果我们把“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放在一边，将目光聚焦到1966年8月最初的那几天，就会发现，红卫兵还只是北京少数中学里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刚刚在八月一日发出，还不为社会所知晓。在北京师大女附中，8月5日卞仲耘被斗死那天，红卫兵是否已经存在，红卫兵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也存在若干尚待澄清的疑问。所以，红卫兵运动不可能是同时触发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卞仲耘事件”的原因。同样的，这两个事件也同造反派没有关系，当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说法，连“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都还没有出现在群众运动中，遑论造反派的组织。

笔者认为，触发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的是同一个信号：撤工作组。向高等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是当年6月份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时，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做出的决定。工作组进校背景是，6月初由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在全国广播，导致了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原来领导班子的瘫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接替这些失去权威的领导班子，恢复秩序，并引导学校的运动，将其重新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镇压怀疑和蔑视它权威的个人和组织，一方面也制止了学生对教师和领导的乱批乱斗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是，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将一些党团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身上淋墨汁、戴高帽子、罚跪、殴打的情况。工作组发现这种混乱状况后迅速予以制止，并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并通报全国，要求全国参照处理。七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指责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下令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撤工作组这个信号的含义一开始是模糊的，因为毛泽东在七、八月之交的反对工作组的讲话还没有流传到社会上，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要到八月五日才在中央会议上公布。但是，撤工作组本身就是给全国的学生发出一个信号：工作组的种种强调秩序和政策的规定，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撤出工作组的消息就在八月三日白天传达到南京师范学院，学生中少数政治敏感性高的“积极分子”从这个信号中体会出，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了，所以决定当晚就去揪斗学校领导。他们毕竟是大学生，对上面的政策变化规律有所把握：“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从公安厅的调查材料中看，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平民出身——在南京师院这样的学校，不大可能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还有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没有理由对吴、李夫妇和其他师长怀有个人的深仇大恨，这个“机会”无非是要将野蛮和暴力施加到任何党所指定的“阶级敌人”身上，来表现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革命”。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对于撤工作组的反应，可能要复杂得多，这里的学生虽然比南京师院的学生年轻，但是她们中有不少中央高干的女儿，对于高层的党内斗争，有着比大学生更深入的认识。例如，该校高一学生邓榕回忆她在7月29日出席宣布撤销工作组决定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时，用“极端的压抑和沉闷”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她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这“父辈的言语”里有一句人们直到今天还记得的话，那就是她父亲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她们知道，她们的父亲犯了错误，而且应该预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冲着她们的父母来的。为了减少将要到来的对她们父母的冲击，他们要把运动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地排除社会其他阶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参与。于是在几天之后，干部子女内心深处的“压抑和沉闷”、“抵触和无奈”这种情绪就转化为一系列的口号和行动，包括对联“老子革命儿英雄，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口号“只

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出笼，以及在八、九两个月里，导致北京一千多平民死亡的“红色恐怖”行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全社会。师大女附中当年的学生叶维丽（笔名白芳）在她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恐怖行动达到的“震慑”效果，不过没有看出这种震慑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告诉全社会：不要挑战干部子女对于运动的控制权。谭力夫当时在关于那副对联的辩论中说得比较直白：“共产党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8月24日，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开进清华大学撕大字报，抡皮带大打出手这一事件将干部子女的这种“集体下意识”表现得尤其明显，它同全社会的比赛“革命”的氛围合流，使卞仲耘不幸成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牺牲品。

前边说过，学生们对于卞仲耘、吴天石和李敬仪这些领导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以及其他死于“红八月”的校长教师们，之所以成为文化革命“祭旗”开刀的牺牲品，并不是由学生们选定的。早在六月份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后，卞仲耘就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严重”的揭发批判对象。而吴天石夫妇的命运，则决定得更早。1966年“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达后，全国各省就仿效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做法，纷纷抛出本地的“三家村”发动群众批判，这些人大部分是本省文教界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就很自然地就被省委定为批判对象，6月份在《新华日报》上遭到点名批判。他写过一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的小册子，被批为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是他“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7月份，江苏省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吴天石属于会上点名批判的四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前，卞仲耘和吴天石夫妇，已经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跟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任人处置的羔羊，工作组一撤走，就成了学生们“表演”革命的道具，来实践他们从雷锋那里学到的精神——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所以，吴天石夫妇虽然是被学生们残害致死的，江苏省委也是负有责任的。文革结束后，南京师院在1978年9月的调查简报承认了这一点：“八月初，撤出驻高校工作队的决定传达后，南大、华水等校先后发生在校内搞游斗的事件。而新华日报上点了吴天石同志的名，南师党委扩大会上对李敬仪同志的揭发批判，也为南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乘机利用。”1980年4月的省公安厅的调查报告说得更具体一点：“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二十篇文章，点名批判原教育厅长吴天石同志。同年七月九日到二十八日南师党委召开扩大会，批判付书记李敬仪同志。”——因为这些报告都是内部文件，有的还标有“机密”字样，从来没有准备同公众见面，所以不妨将事实真相讲述得坦率一点。文革后复出的省委领导大概会联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流传千年的名言，说这话的东晋高干王导，当年就住在建康的乌衣巷里，离今天的江苏省委大院近在咫尺。然而在论及责任的时候，两份报告都回避了省委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学生身上，仿佛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无可指责，反倒是学生们“别有用心”利用了它。笔者觉得，报告的起草者自己心底里并不相信这种扭曲的歪理，不过是担心公布真相和追究学生会牵连出当年省委领导——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革命家”——应负的罪责。所以他们一方面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学生“免于刑事处分”，一方面提倡用“宜粗不宜细”的态度来对待文革历史，将一笔糊涂帐塞进档案袋，指望岁月把这一段历史尘封起来，让时间的流逝使之归于虚无，被后人忘却。

他们几乎成功了——在事件发生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少数关心这件事的人，也只能通过民间的访谈了解到事件大概的经过。尤其是那些带头发动批斗，动手行凶的积极分子，成了没有面目的学生甲、学生乙。唯一的一个被追究责任的人叫做汤大民，事件发生时，他是中文系的助教。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南京师院的代表在宣布逮捕他的大会上的发言。细看这份资料，就会发现，即使是汤大民，它的被捕主要也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八三”事件，而是因为他作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中幸存到文革后期的“造反派”代表，属于当权派痛恨的“帮派分子”，在1976年同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串连，上了“四人帮”的贼船。笔者相信，如果不是后面这个罪行，他在文革初期参与“八三”事件的罪行同样不会

受到清算。

然而，冥冥中的某种机缘让这几份档案资料流落到民间从而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使得埋葬真相的努力功败垂成。今天借助这些公开的档案资料，这段接近“虚无”的历史变得“实有”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具体情节——无可怀疑，实有其事；知道了那些积极参与者的姓名和他们所属的系科年级——无可隐遁，实有其人。当然，这些人入都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少数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再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已经太晚，也确实没有多少意义了。然而，他们的姓名以及行为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人的镜鉴，这比追究他们的刑责更有意义。

南京师院“八三”事件档案资料的公开基本澄清了这一公案的真相，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至今仍然存在的纷争。比较起来，后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前者，不仅有大量的回忆和评论，还被拍成了电影。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学生站出来表示忏悔，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她们中没有一个是暴行的参与者的身份来忏悔的。她们中有人是旁观者，悔恨自己在事发当场没有勇气挺身保护受害者。也有像“八五”事件时学校的负责人刘进、宋彬彬等人，表示“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刘进语），她们歉疚和悔恨的是，作为学校当时的负责人，没有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进一步，她们也承认了在运动早期，写过大字报批判学校的领导，导致后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这些表态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有一点是这些叙述中缺失的，那就是，回避了一个中心问题：1966年8月5日那天，是谁发起了对校领导的批斗？谁在批斗过程中使用了暴力？至今没有一个学生出来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目击者站出来指证那些责任者。只要这个问题的解答仍然是“虚无”，真相就不可能澄清，纷争还将继续下去。另一个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冯敬兰认为，纷争各方其实都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都“打死也不说”。她说：“既然争议双方都知道打死校长的人，为什么不说出她们的名字？叶维丽在她的调查文章中没有提，实际她是知道的；高一校友王友琴在写校长之死的文章中，也仅仅提到高一部分学生，她也不肯指出名字。我相信王友琴在调查过程中或许受过恐吓，因为正是她所在的那班部分学生干的。批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全程目击者，也有许多‘片断’场面的目击者，她们至今还记得谁打了校长，谁最凶狠。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说出那些名字。”（见本刊zk1005d：《关于卞仲耘案的凶手》）

南京“八三”事件档案的公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这一难题的启示：如果一般的平民有种种的顾虑不敢说出真相，我们有理由要求官方公布有关的档案资料。“八三”事件在发生后几天之内，省公安厅就写出了事件的调查报告。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到1980年，南京师院和省公安部门又重新作了调查并写出了报告。我们不禁要问，北京的“八五”事件，刘进等人当天晚上就汇报给了北京市的领导吴德，吴德除了口头的指示，包括那句现在人们熟悉的“死了就死了”以外，有没有进行过像样的调查，有过什么样的调查结论和书面报告？北京在1966年八、九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被打死，其中有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员，公安部门当时还没有被“砸烂”，不可能连一份调查报告都没有。这些报告应当存放在北京市某部门的档案室里，根据我国几年前出台的保密法，就算这些档案属于“绝密级”，也已经过了三十年的保密期限，北京市政府应当无保留地公布已经解密的这些档案的目录，研究者或一般的公民都有权要求查阅。

退一步说，即使文革中的档案可能有所遗漏和丢失，那么文革后，有关部门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调查的，刘进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在访谈录《面对历史的责任》（《记忆》第80期）中说，“对8·5事件，文革后我至少接受了两次调查，给组织写过材料。”这说明了两件事：一，“组织”在文革后进行过对“八五”事件的调查，找过刘进等当时相关人士了解情况。二，刘进等人也写过书面的材料上交“组织”。这些调查的报告以及受调查人士提供的材料到今天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它们在那里？为什么不说清楚这是个什么“组织”？难道这个“组织”可以不遵守“保密法”的规定，无限期地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手里的档案吗？

当然，我们不能对“组织”自动公开那些档案寄予过高的期望，毕竟，“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南京师院的档案也不是通过正常的解密程序公开的。那我们只能再退一步——诉诸知情者的良知。刘进在上面同一篇访谈中谈到，她曾给叶维丽两份1978年写的调查草稿。还说，“在交给学校的调查报告里（2010年4月）注明，走访老师16人（13人为女附中老师，3人为工作组老师），同学96人（92人为1966年的在校生，4人为其他届别的学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忆、印证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问了那么多的人，不会不问到那个中心问题吧？印证了哪些结论呢？笔者希望，刘进，宋彬彬和叶维丽等手里掌握较多资料的人，请把你们同“组织”分享的资料也拿出来同公众分享。作为“组织”的人，你们固然要对“组织”负责，但你们首先是社会的人，也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尤其是，对受难者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家属，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你们并没有直接发起和参与致死卞仲耘人的暴力事件，也已经在一些场合为自己的责任表达了忏悔，对这些没有多少人有异议，因此没有必要为自己作更多的撇清。但是作为当时学校的负责人，文革后又为“八五”事件调查做了很多事。比起一般的公众来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受到更多的保护，你们有义务比一般的知情者做得更多。无论是责任还是义务，都要求你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真相见到阳光，也有助于消除人们——包括受难者家属——对你们的长期质疑和不谅解。因为真相，只有真相，才是谅解与和解的基础。

2013年2月6日于美国

~~~~~  
【各抒己见】

否定文革面面观（下）

• 沈 昆 •

（续 z k 1 3 0 2 a）

否定文革还必须触及文革试错的终极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

在苏中等国实践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快实现工业化的成就，但都发生了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情况，并由于经济发展失衡而出现过大饥荒的危害。面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这些问题，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并且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前提下，显然只能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困难是由于管理人员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因此，通过文化革命，由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批评监督管理人员，净化管理者的思想，就成为值得尝试的途径。

然而文革的失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管理人员的思想“无产阶级化”加以解决。文革中造反派夺权后就会异化的事实表明，革命者成为管理者之后发生的异化绝非只是思想的原因，而有其更为根本的职业分工的原因。

进一步思考就不难发现，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悖论就在于，名义上所有权的公有与实际上支配权的官有（私有）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使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公有制下社会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荡然无存，而且造成了权、责、利的不相适应，拥有支配权的不必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买单的总是拥有名义所有权的公众，获利则大头归管理者所有。因此，这是最不负责的经济制度，也就完全没有公平可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反而有其公平合理的一面。

所以，否定文革也必然应该否定文革所证错了的马记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社会弊病，当其危害仅仅涉及少数社会成员时，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只有在其危害波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时，这种社会弊病才会引起社会大多数的公愤，才有可能“寿终正寝”。文革正是这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共产党执政的种种弊病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危害涉及面之广可谓空前，为中国消除这些社会弊病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文革的全部正面意义本来在于以其证错的负面结果告别马记社会主义，实现全面改革。

如果文革的结束是顺着“四五”运动的自然走向，经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文革的否定应该是社会各阶层反思的共识，文革的经验教训应能得到正确的总结吸收，中国的改革则应能既达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又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文革的终结实际上却是以权贵集团内部的武力政变的形式实现的，实质上是一部分权贵摘取了即将成熟的桃子，成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因而，文革的否定似乎成了权贵们的恩赐，也就必然以权贵（原“走资派”）们还乡团式的清算方式进行。其结果就是，文革前既已存在而文革中推到极致的那些有利于权贵统治的一党专制弊病不但没有根除，反而发扬光大，甚至借机清算了文革前尚为共识的那一点公平正义。因此才会有今日的畸形社会发展，才会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脱节。

正确总结吸取文革教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于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文革结束，但肯定文革“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2）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重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二十八章。

（4）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先被“正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称为与工人农民并列的我国三支基本力量之一。

（5）印红标：《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原载石刚编著：《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1967年11月13日，8341部队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见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

（7）1966年6月9日至8月4日主要参见穆欣的文章：《关于文革初期工作组派出与撤销问题》

（8）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9）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10）转引自王友琴：《八月祭》

（11）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http://www.takungpao.com/history/content/2012-04/13/content\\_20360.htm](http://www.takungpao.com/history/content/2012-04/13/content_20360.htm)

（12）邱心伟，原属育：《清华文革亲历》，43—48页

(13)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78-mcs-2002-issue-3/1250-2012-01-06-08-38-50.html

(14)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337期,增刊第503期

(15) 单于仁模对章立凡文章《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的跟帖,后被网友称为“文革失败路线图”,见多维网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50526&ci=351715#comment-351715  
http://blog.dwnews.com/post-50553.html

(16) 参见金中的文章:“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原载《开放》杂志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08

(17)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5月

(18) 王力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出版社,1998

(19) 朱健国:《地震预报改革失败随想》http://blog.boxun.com/hero/200810/zhujianguo/1\_1.shtml

(20) 李毅:从人均寿命看毛时代和改革时代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8-23/4263.html

(21)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